

北魏太和期的中心柱窟

张宝玺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心柱窟，又称塔柱窟，置塔柱于窟内，根据学者对云冈石窟的分期，云冈石窟的中心柱窟始于第二期（471~496），其绝对年代大部分在太和年间。其具体洞窟有第1、2窟和第6窟。第6窟完工于太和十八年（494）迁洛之前。从排年上看，第1、2窟约早于第6窟^①。这种以纪年为依据的可靠排年，是其他洞窟所不具备的，就中心柱窟而言，有纪年的洞窟以云冈第11窟最早。迁洛以前的孝文帝时期，是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及其影响时间之长，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中心柱窟亦是如此。特别是第6窟的形制多被地方所采取，对它的年代较早的大型中心窟的起建影响尤为明显。

甘肃省境多石窟，仅中心柱窟就有50多座。分布并不均衡，大部集中在河西，成为河西石窟中主要的窟形。陇东地区中心柱窟很少。仅有2座，却很重要。麦积山和炳灵寺不见这种窟形。

根据笔者的调查研究，甘肃境内的中心柱窟，以陇东泾川王母宫大佛洞和河西肃南金塔寺石窟时代最早，也最为典型。它们都是大型中心柱窟。可惜它们都缺少有关建窟的记载，其年代只能用考古的方法比定。若和云冈石窟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应始于太和末年。与云冈第二期中心柱窟比较接近，特别与第6窟更为接近，稍晚于第6窟。约建于5世纪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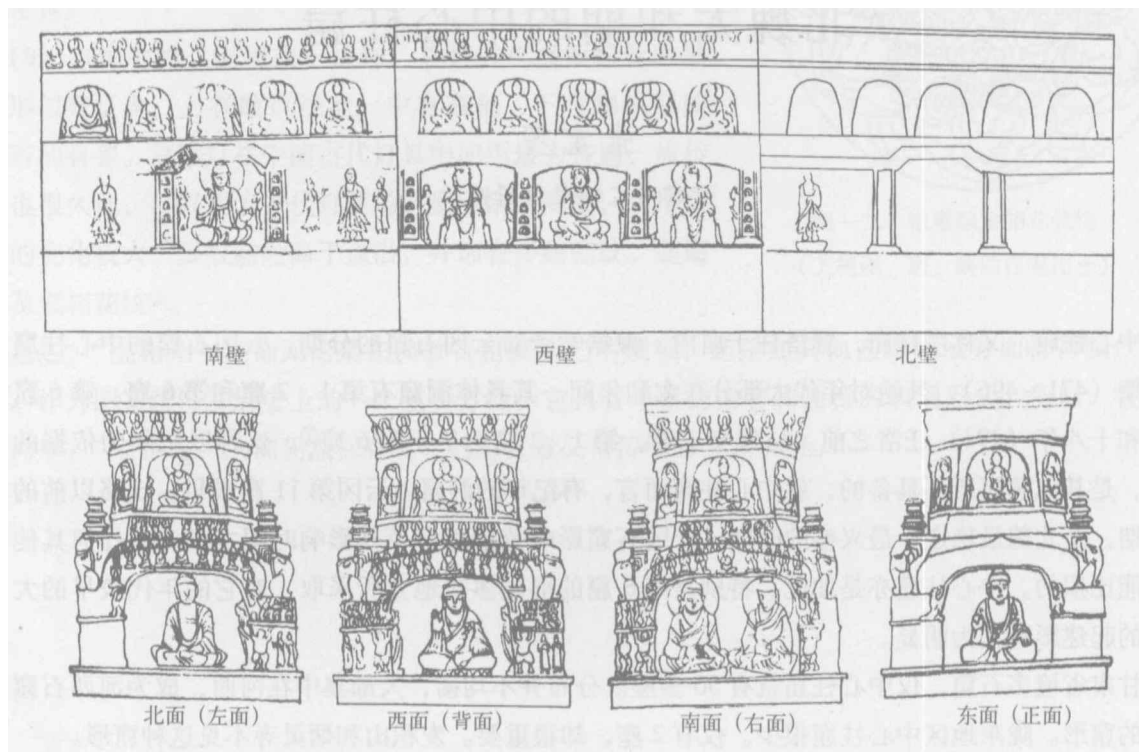
泾川王母宫大佛洞中心柱窟，中心柱为金刚宝座式，仿五塔制^②。中心柱方形基座以上分二层，下层为方形柱体，上层转为八角形柱体，此八角形柱体象征中央大塔。四角拱卫环立着四座由大象驮负着的方形三层密檐小塔，形成中央大塔耸立四角四小塔拱卫的金刚宝座式中心柱。下层四面龕，除南面龕雕释迦多宝佛并座外，余三龕皆雕坐佛及胁侍二菩萨，龕外浮雕托龕力士及供养菩萨二身或四身。中心柱上层八龕各雕坐佛，未见交脚菩萨，七佛及交脚弥勒菩萨的组合并未用到中心柱上，而是每龕一坐佛。窟壁布列龕，从保存较好的南壁看，窟裙以上分二层布龕，下层三龕中龕为坐佛，左右为立佛。上层布五坐佛列龕，其上尚有小千佛一排。西壁（正壁）历经重修，布龕与南壁相同。北壁甚残，仍可见里侧

① 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② 张宝玺：《甘肃泾川王母宫石窟调查报告》，《考古》1984年第7期；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文管所：《陇东石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

龕一立佛殘迹，布龕與南壁相同。窟裙壁面甚殘，原來是否有佛傳雕刻無法確認（圖一）。

龕形分兩種，中心柱上的四龕龕梁皆為圓拱形，梁端二龍反上，龕柱由二力士承托，龕楣為尖拱形，其上再加造一圓拱形之龕楣，形成雙層楣，上布滿小坐佛或供養天。窟壁列龕皆為梯形龕楣，小八角形龕柱，柱頭衬替木，圓形柱礎。梯形龕楣及小八角柱在云岡石窟很普遍，而在甘肅石窟中這裡為僅見。



圖一 涇州王母宮大佛洞造像示意圖

中心柱四面龕像左右上側的位置皆浮雕佛傳故事，故事情節有着連續性，其排列形式也和云岡第6窟如出一轍。計有八幅，可見者四幅。若以右旋順序排列，現正面兩幅被牆體掩蔽，內容欠詳。右面左側一幅亦被牆體掩蔽大半，僅可見一坐著的菩薩。右側一幅為行走著的三婆羅門狀的人物雙手各在胸前捧物。背面左側一幅其右側坐著二菩薩，左側台上三人背物。右側一幅為釋迦與釋種試斫多羅樹，三人各砍一樹。左面左側一幅為釋迦與諸釋種比試象技，三人各執一象。右側一幅被牆體掩蔽內容欠詳。

王母宮大佛洞建窟年代原推定為北魏孝文帝太和末年至宣武帝景明、正始、永平之際。新論則推定為涇州刺史杞嶷創建，此論由溫玉成先生提出。暨遠志先生作了進一步考證^①。杞嶷即抱嶷。抱嶷

^① 溫玉成：《中國石窟與文化藝術》177 頁，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 年；暨遠志：《王母宮石窟窟主及開鑿年代考》（待刊稿）。

任泾州刺史,是在太和十八年(494)至宣武帝(500~503)初,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三有《后魏化政石窟铭》存目,文记“后魏化政寺石窟铭,杞嶷造,文帝大统七年(541)十二月”。此碑铭今已不存,碑文内容欠详,从存目来看,可以理解为造窟或立碑。从抱嶷生活的时代考查应为建窟。石窟之创建到文帝大统七年(541)立碑相距40余年,新论将化政寺石窟推定为今天的王母宫大佛洞。它的创建年代在抱嶷泾州刺史的任期内,其绝对年代更进一步推定为494~500年之间。

陇东地区多石窟,皆为大小方窟,而中心柱窟仅有王母宫大佛洞和庆阳北石窟北1号窟。在宫山脚下,仅有这一座大型中心窟,别无它窟。而寺院延续的时间较长、现存相当数量的北朝、隋唐石刻造像,它们置于佛寺之中。该中心柱窟比定为泾州刺史抱嶷这样的人物所建极有可能,抱嶷身为宦人,云冈第5、6窟兴建之际时任大长秋卿,主管后宫,深谙云冈石窟的建造,随后外放泾州,这种从云冈到泾州之间,其关系更为直接。

可以佐证王母宫大佛洞起建于太和末年的,在陇东地区尚有几尊太和年间的石窟小龕像及石刻造像;有纪年的石窟和石刻造像有太和十二年(488)宁县成丑儿造像碑;太和十五年(491)合水张家沟门石窟龕像;太和十六年(492)灵台郭元庆造像碑^①。它们是陇东最早的像龕,无过于此者,而大型石窟的雕凿则属泾川王母宫大佛洞。此后遂有北魏永平二、三年(509~510)泾州刺史奚康生泾州南北石窟寺的创建(现分属庆阳和泾川辖境)。同时尚有佛寺的兴建,北魏泾州阴盘故城禅佛寺遗址(现平凉市东20公里),其寺散见石刻造像中有北魏景明四年(503)纪年造像,其中某些造像又约早于此,也可能是始于太和年间的佛寺。稍后尚有北魏永平二年(509)泾州城南嵩显寺的启建。北朝时泾河流域泾州段石窟鳞次栉比,王母宫大佛洞则为其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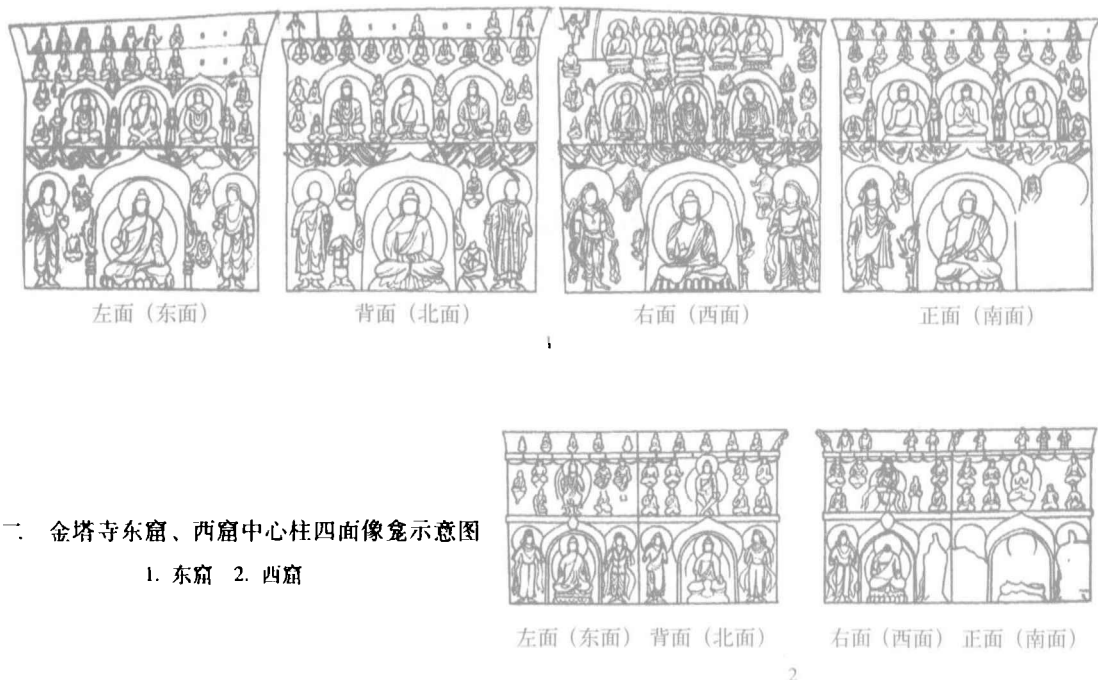
肃南金塔寺石窟仅有两个中心柱窟,东西向排列,称东窟和西窟,东窟大,而西窟小。

东窟,窟前崖面坍塌,有无前室迹象已不明显,仅窟顶部仅残存一点痕迹,可以推知原有人字披顶。塔柱四角有方形角柱,角柱的迹象以左面泥皮剥落处暴露出石胎的那部分最明显。若与云冈第6窟塔形柱角比较,这里是其被简化了的角柱。另外,塔柱上下之间塔檐也被省约,留出来的面积最大限度地用来安置造像。虽然角柱及塔檐被简化或省约,但其仿木结构的形制仍然有所体现。

中心柱体分二层造像,下层东、南、西面龕皆为坐佛并胁侍二菩萨,北面龕为坐佛并二弟子和二身较小的天王。上层四面各塑三坐佛,其中左右面为交脚佛装弥勒居中的三佛,右面左侧为释迦苦修像,正面和背面为三坐佛像。三佛龕像的上部各塑十佛十菩萨(西面是喇嘛教重塑的五方佛),窟顶四披各画立佛十身。窟壁壁画千佛,三壁总起来可达三千佛以上(图二)。

西窟,中心塔柱上分二层造像,下层四面龕,正面(南)、背面(北)、右面龕(西)各造一坐佛二菩萨(正面龕像甚残),左面龕(东)造一坐佛一菩萨一密迹金刚,上层四面倚壁造像,正面和背面为坐佛(正面已重修为宗喀巴像)和佛装交脚弥勒。左右面为倚坐弥勒和舒相菩萨,其上每面为五身坐佛或五身天宫菩萨,似取其十方佛之半,为五方佛。窟顶画供养菩萨及飞天,窟壁画千佛,已残失大半,现存者尚有千余身。正壁千佛中显三铺说法图。估计完整的时候千佛数目在三千身以上。仍

^① 张宝玺:《甘肃佛教石刻造像》,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



图二 金塔寺东窟、西窟中心柱四面像龕示意图

1. 东窟 2. 西窟

为三世三千佛的表现。

金塔寺石窟的年代，主要有北凉说和北魏说。笔者认为北魏建窟，在孝文帝太和十一年之后，到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487～508），这是从对张掖地区的史地考查和佛教发展情况得出的^①。持北凉说者，认为金塔寺石窟早于云冈石窟，因此金塔寺石窟才是云冈石窟的初祖和范本。笔者认为河西的地理环境及北凉的历史背景、经济实力尚达不到主导全国造像的水平。佛教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有它的规律，一般由文化较高的地区形成模式，向边远地方扩展。佛教之传播，就河西而言，有东渐和回转传，金塔寺属于回转传。这里以炳灵寺西秦石窟造像为例。在全国有纪年的石窟中是最早的了，也有着回转成分，如无量寿佛、维摩诘、释迦多宝的造像和壁画还是受早于此际的东晋佛教艺术的影响。东晋戴逵塑造无量寿佛，顾恺之首创维摩诘均记载于画史。瓦官寺释迦多宝亦见于记载。金塔寺中心柱窟模自云冈中心柱窟应是主要成分。

金塔寺东窟中心柱上选定三佛，确实与云冈第6窟有所不同。究其原因河西重千佛信仰，该窟总体为：上层四面龕塑三世佛；其上影塑十方佛或十菩萨；顶部壁画十方佛。窟壁画千佛，总数在三千以上。三世十方和三千佛应是其立窟的主旨，即过去庄严劫、现在贤劫、未来星宿劫的三世佛及千佛和无限空间的十方佛。本窟十方佛及千佛未见题名，与此窟时代相近的千佛洞第2窟中心柱上层同样

^① 张宝玺：《河西北朝中心柱窟》，《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河西北朝石窟编年》，《1994年敦煌国际研讨会文集》。

是三世佛其上的十方佛有题名，残存五则，它们是“东南方无□□佛”、“西南方宝施佛”、“西北方□□佛”、“下方明□佛”、“上方□□□佛”。经查，它们出自东晋佛陀跋陀罗《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十一《念十方佛品十方佛》^①。失译的《十方千五百佛名》也有部分佛名相同。现在两经佛名及题记佛名作表如下：

马蹄寺千佛洞第2窟十方佛名	东晋佛陀跋陀罗《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十一《念十方佛品十方佛名》	失译的《十方千五百佛名》
	东方善德佛 国名宝安隐	
	南方旃德佛 国土琉璃为地恒沙宝色	南方旃德佛
	西方无量明佛 国土黄金为地	
	北方相德佛 国土颇梨色	
	东北方三乘行佛 国土白银色	
东南方无□□佛	东南方无忧德佛 国土七宝色	
西南方宝施佛	西南方宝施佛 国土五宝色	西南方宝施佛
西北方□□佛	西北方华德佛 国土琉璃颇梨色	
下方明□佛	下方明德佛 国土金色金光金云	下方明德佛
上方□□□佛	上方广众德佛 国土五百亿宝色	

此经在金陵（南京）道场寺译出，未具译经时间，佛陀跋陀罗卒于元嘉六年（429），当在此前不久译成。佛陀跋陀罗是“以禅律驰名”的一代佛教大师。千佛洞十方佛的题名与《佛说观佛三昧海经》相同。由此可见该对河西佛教影响至深，对造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直之采用该经的十方佛题名。

此经所说的是禅观及观佛功德事，观三世佛、十方佛、三千大千世界诸佛可以成就无量功德。所观十方佛如此经所说“佛告阿难，佛灭度后佛诸弟子，欲观十方佛者，于念佛三昧中但知粗相当自然知无量妙相，如是观者是名正观。若异观者名为邪观。得此观者见佛无数不可限量，如此定者名见一切诸佛色相”^②。观十方佛和“见佛无数不可限量”的千佛是融为一体的。此类壁绘千佛的千佛洞是河西石窟的通例，数十座中心柱上造像，窟壁绘千佛的千佛洞大凡都是如此。

中心柱窟的演变经过了几个阶段，由印度中心置覆钵塔的支提窟，到我国新疆境内古龟兹甬道式中心柱窟，进入中原后演变为塔柱窟。塔柱窟是吸收我国固有的木构建筑结构形式。以佛塔为中心的佛寺在我国早以流行，中心柱窟则是将塔柱移植于石窟中，北魏都城平城多佛塔，天兴元年（398）“始作五级佛图”；皇兴年间（467～471）“于是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300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皇兴（467～471）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椳栌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

① 《大正藏》卷十五 694～695 页。

② 《大正藏》卷十五 694 页。

固巧密，为京华壮观。”^①先于中心柱窟的这些石塔的建造对于中心柱窟的形成有更为直接的影响。云冈第6窟是有纪年可考的最早的中心柱窟，影响到地方石窟的造型，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本文所述建于太和末年之后的泾川王母宫山大佛洞及肃南金塔寺其形仿自云冈，所不同的是其龕像约有调整。

^① 《魏书·释老志》。